

最初的艺术教育与理想主义

潘公凯



潘公凯作品

我最初的艺术教育，是在家里面熏陶得来的，是不知不觉的。如果从时间之流里明确切出一个界标，那还是1964年至1968年在浙江美术学院附中的学习。

说起来，我考上浙美附中不是特意努力的结果。当时，我读的杭州第四中学（原杭州第一初级中学）是全省最好的初中，我完全可以升本校的高中部，考杭州最好的高中也没有问题，所以我根本没有必要去附中。但是我的图画老师一定要我去考附中，因为在图画小组里面我画得最好。他对我教得真是尽心尽力，当时学校里面的石膏教具总共没几个，也就是立方体、圆柱体和伏尔泰等几个头像，还有一个维纳斯。图画老师认为画维纳斯最难，其他人都不准画，他认为只有我一个人达到能画维纳斯的程度。他希望我报名去考浙美附中，我不肯去，我觉得画画这种事儿，好像成绩比较差一点的才去考，我有点不甘心！后来，这个老师去附中给我报了名，五毛钱报名费也是他出的，回来告诉我说：“我已经给你报名了！你还是去考一下吧，你考完了以后就是不去都没关系。”

我记得考试是画一个瓦罐，一个瓷盘里面放一根葱。考试的时候，我的状态特别放松，完全是玩儿，我的那个瓦罐素描画得特别好。瓦罐本来就酱油色的黑乎乎的，我画得特别狠，整张图画得很重。我当时已经有这个感觉了，有点儿懂得图画要画得重，画得狠。考完了根本问都没问，就是没当回事。过两天，附中的女校长就跑我家里来了，跟我父亲说：“潘先生，公凯考得非常好呀！他是第一名！听说他不想上附中呀，我想考别的高中。哎呀，就上我们的吧！我们还是很好的。”动员我父亲来做我的工作。父亲就和我商量：“要不然就去读？如果不去画画，你也挺高兴的。”我思想斗争了两三天。关键是当时学理工科究竟学什么自己也没明确，一时没了主张，这个时候有了学画画的机会，我有点茫然，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去考别的学校，我也有些抹不开老师们的面子。我就这么糊里糊涂地上了附中。

我在附中学画的时候，曾经迷恋过19世纪末俄罗斯的油画，像苏里柯夫、列维坦等等，特别喜欢谢洛夫，我觉得他画得潇洒，特别有灵气。也喜欢柯勒惠支的素

描和版画，看着觉得特别过瘾，喜欢她深沉的力量和对生命价值的独特感受。在我家里，还有一些德国表现主义风格的画册，是东德一位朋友送我父亲的，我也很喜欢。当时，罗马尼亚画家博巴在浙江美院任教，他的油画吸收了中国写意精神，大笔触，很整体，也用黑线。父亲也喜欢他的风格，将他送的一幅大白玫瑰挂在画室里。我在附中时，也学国画，不过是大家都学习的东西。我的素描成绩一直很好，那个明暗调子、空间感，道理容易懂，一想就明白了，马上就可以用到各种作业上去。我父亲是根本不问我在学什么、画什么。他对我的学习能力十分信任。后来我们在附中时，下乡、下厂的时间越来越多，我们就在乡下或工厂画速写。

附中的课堂学习，我不是最用功的，虽然成绩一直很好。从小到大，课堂学习一直不是我的重点，因为我觉得功课好并不很难，而且是理所应当的，我的专注点还是在课外。我开始喜欢哲学，买了大学的哲学课本。这个时候我对于理想，对于自己今后需要承担的责任、义务和困难已经有所准备了。

我们刚上附中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大家总是吃不饱。我家里的条件比较好，浙江省总共有三五个高级知识分子享受省级领导待遇，父亲是其中之一，每个月有一辆三轮来，送点油、糖、肉、米。我在附中住校，坚决不回家吃饭，连礼拜六、礼拜天也不回家吃饭。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我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吃得好，但是干活我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差，我的付出绝对不能比他们付出得少。在附中我是第一次住校，但是对于独立生活一点都不感觉到困难，而且苦活、累活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干，同学们不愿意干的事我也干。一般男同学的老手，我不仅能把被子缝得非常服帖，还会缝缝缝机补衣服。有同学生病了，总是我到医院去照顾。我还给同学们理发，到店里面买了全套的理发工具，我的手艺在附中是出了名的。

因为相对于我准备承担的责任、义务和困难来说，这些的确不算什么。我甚至觉得自己的条件还不够差，总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物质生活条件降低，让自己吃



潘公凯作品

苦，使自己获得锻炼。这样一种自我要求，恐怕真的跟我读的那些书有关系。

在上附中前我已经读了一些传记，像《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列宁的青年时代》、《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刚考上附中的1964年暑假，我读完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非常喜欢。我对自然中的物理现象，从原子结构到天体物理，始终怀抱着极大的兴趣，想设法找书来看。当时，不仅有介绍达尔文的书，而且也开始了有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小册子。这些书曾使我十分兴奋，也构成了我早期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65年暑假，我读了列宁的《哲学笔记》。当时我没有条件找到书中涉及到的许多哲学原著，只能猜测着理解那些复杂的语义，这对我的逻辑思维能力，着实是个很好的训练。

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新人的故事》，是对我相当重要的一本书，让我头脑中理想的乌托邦具体化，让我看

到了生活在具体可信的情节中的书中主人公，也使我明白了什么是革命者。拉赫美托夫是《怎么办——新人的故事》里面的主要英雄，着墨不多，露面很少，是一个很隐蔽、很神秘的人物。他晚上睡钉板，白天穿干净的衬衫将背上的血迹遮掩起来。他既是学者，又运筹帷幄指挥革命运动。拉赫美托夫是当年青年理想主义者效法的楷模，对我来说，很长时间都起着榜样的作用。理想主义、自我要求和牺牲精神，是我在早年就为自己确定的做人的基调。

当时我也能读到一些现代散文名篇，像朱自清、闻一多、郁达夫等等，但最喜欢的是鲁迅，尤其他的《野草》是我钟爱的文字。鲁迅对朋友说过，他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野草》连同题辞一共24篇短文，文字隐晦，却露出了鲁迅灵魂的“真”与“深”，呈现了鲁迅生命的存在。所以鲁迅又说，并不希望青年人读他的《野草》，那是“为自己的”。我的心智大概从小

就比较早熟，读到鲁迅的时候最喜欢《野草》。透过鲁迅混杂、模糊的文字意象，我强烈地感受到人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困境，甚至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黄金世界”里也可能有的黑暗……《野草》里的那种悲凉，我虽然感觉得到却说不清，因为当时的我正是鲁迅所谓“如我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过客》曾问：“前方是什么？”小女孩说“前面是花园”，小女孩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老人回答说：“前面不过是坟。”显然老人的判断更接近真实。可是在确定了“前方是坟”以后，我们仍然有两种人生态度可以选择：老人认为既然前面注定了是坟墓，人的奋斗就没有了意义，这是现实的悲观主义者态度；过客明知前面是坟墓，奋斗一定没有好结果，但是仍然要往前走，他觉得前面有一种“声音”一直在呼唤着自己，这声音其实就是内心的命令。过客的态度，是鲁迅自己的选择，后来也成了我一生的选择。

官员收藏热与“雅贪”“雅贿”

吴 树

层出不穷的“雅贪”

有人给中国贪官的腐败形式添加了一个新品种，叫“雅贪”。其实要认真考究起来，“雅贪”这词儿也算不上网友们的新创。中国自古就有“粮油一分利，百货十分利、珠宝百分利、古玩千分利”的说法，因而以文物古玩行贿，早就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了。

有人戏称当代中国贪官“收藏热”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的贪官很“土”，只知道收藏现金，往往一出事就在他们家里搜出一大堆纸币或存折，通常是数数钞票就可以给他们定罪；第二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初，贪官们更加年轻化、知识化，他们除收藏现金外更偏重收藏美女，只要把他们从情妇的床上揪下来就可以“人赃俱获”；第三次浪潮则是在中国文物市场开始跑火以后，“精英化”的中国贪官们精通经济、“略输文采”，受贿不收现金，只收文物。这种变化的好处是回避了直接的权钱交易概念，一旦东窗事发，文物的价格无法准确衡量，不容易定罪。假若不出事，收藏文物也是保值增值的最佳选择。

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受贿案就是典型事例，当地同仁们介绍，此贪官平日不喝酒、不抽烟，也不近女色，唯一的爱好就是收藏名人字画、古玩和瓷器。在马继国落马受审后，纪检监察人员在他家里查获了整整5箱的名人字画、古瓷古玉等赃物，价值昂贵。

在马继国身前身后，中国各地都出现了一批有“雅贿”罪嫌的贪官。2002年，原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原河北省沧州市委书记薄昭铨因犯受贿罪，分别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和无期徒刑，在两位贪官被依法没收的财产中，都发现有数量可观的珍贵文物。仅薄昭铨一人，就接受“雅贿”名人字画59幅，其中包括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楷书七言诗》、范曾的人物画、董寿平的《墨竹》、启功的《行书七言诗》等等。

2001年，原沈阳市市长、大贪官慕绥新因贪污罪被判判处死缓。此人嗜古懂字画如命，按照古董的价值高低回报“雅贿”者不同级别的官职。据办案人员介绍，当他们进入“慕府”后，“眼前的景象让人大吃一惊，从金银饰品到玉器珠宝、名人字画让人目不暇接。10多名工作人员在这里清理住了三天才理出头绪。在慕绥新居住的房子里，一次就整理出各类文物和工艺品近400件。那些价值不菲的古董字画，都是有求于他而送上门来的……”

原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王天义，案发之前在当地也是一位“著名收藏家”。案发后经查实，此人在职期间，曾先后收受他人赠送的文物达数百件，家中陈列的古董和字画之多堪称“私人博物馆”。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认定王天义受贿的财物主要由这些价值高昂的“礼物”构成。在

其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中，收藏品的最低评估价值总计高达600万元。这些收藏品包括书画作品195件，古代瓷器及西方艺术品27件，邮票、文物、鸡血石等1351件，其中不乏上乘之品，如价值24万元的刘奎龄书画作品动物四条屏、价值34万元的齐白石春山图、价值8万元的19世纪法国铜鎏金竖琴纹托盘座钟、价值24万元的清乾隆年间斗彩团花罐等。

原浙江省丽水市建设局副局长邹建新曾被人戏称“藏宝局长”。这位“藏宝局长”被批捕后，办案人员在他的秘密仓库里搜查出大量古董，有高档青田石雕、古瓷、古玉、名画等。为了避免招来外界猜疑，邹建新还在家中专门挖了一个40平方米左右的地下藏宝室，专门用来存放这些藏品。后经专案组查证：邹建新的藏品绝大部分均为收受他人贿赂所得……

尽管上面所列举的接受“雅贿”的贪官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一时半刻还难以根除这种秘密室里的“隐形收藏”现象，有关这方面的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还会经常不绝于耳。如：在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等6人的赃物拍卖会上，在字画拍卖环节一位“明星”买家对记者说，他是做企业的，快过年了，免不了要到业务单位和管理部门看看领导。”如果送2000元卡什么的，人家根本

不当回事，有的人都不抬眼看一下，送多点钱吧人家又不敢要。现在很多领导喜欢字画收藏，从拍卖会上买些字画，特别是有背景人的收藏，省事又讨领导喜欢，何乐而不为？”一些参加竞拍的合肥市民也纷纷告诉记者，竞拍赃物是因为“快过年了，买一件古董回去送给领导……”

一面在拍卖获罪贪官的赃物，一面依旧有人将这些赃物与董重新买回去，继续用于另一场“雅贿”。一批“雅贪”倒下去，另一些“雅贪”跟上来，接过“前辈”的藏品，前赴后继，誓将这场“另类收藏”进行到底。

其实，中国官员收藏热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雅贿”代替了头些年的送酒送烟、送美女、送脑白金，几乎已成为屡见不鲜的事了。只不过现在行贿者的社会身份与过去那些送礼的人有着天壤之别。过去送礼的人绝大部分是一些社会底层人士，他们送礼的目的多半为了改善基本生活条件，如：子女升学、就业，本人调动工作、加薪等等；而现在搞“雅贿”的人则大部分都是一些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他们将这种贿赂视做一项基本投资，打进成本核算，诸如：批项目、批土地、批贷款。一句话，通过这种变相的权钱交易，达到牟取最大利益的目的。

“雅贪”之意不在“古”

温故知新

“单打一”即抄近路，是当 前国画创作另一不正之风（编者注：不正之风还有“赶浪头”）。这股风来源于近代画家专长一门或专长一物的风气。有些人急于求成，有意赶这股风，在某一题材或某一物象上死下工夫，以便出人头地。他们看到徐悲鸿的马、黄胄的驴，以为这是一条通向艺术高峰的轻便道路。于是选中马或驴一头扎进去。有的人并不甘心步人后尘，在马驴牛羊之外另辟门径。步人后尘也好，另辟门径也好，他们不懂得走独木桥是达不到艺术高峰的。他们迷信此道，曾有人要我指点窍门，也有人向我取画“舞蹈人”的经。我总是诚恳地劝他们不要走这一条“单打一”的捷径。

我们大家都知道徐悲鸿的马或齐白石的虾，我们在多种题材长期实践中筛出来的精华，并非单打一的产物。至于我的舞蹈人物，也不是我的什么雄心壮志逼出来的产物，而是为了满足报刊读者的需要，和接触这一门艺术的特殊兴趣，加上自己也会舞那么几下，逐渐锤炼出来的。他们以为我老早就修建起这一条独木桥，便于自己行走。我告诉他们，艺术道路如大江大海，经百川汇流，才能达到深广博大。假如只有一摊积水，想养活一条大鱼，岂不是做梦？

画山水、花鸟也许有人从“单打独斗”这条路上拾得一点短暂的荣誉，这种荣誉肯定是虚假的，绝不可靠。人物画却连这么一点短暂的虚假的荣誉也捡不到。因为人是自然和社会的综合产物。要表现人物，必须认识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和社会的关系。因此，要画人，也得画人所生活的环境。如果撇开环境单独画人，画出来的人，就会像温室里培养的标本，像课堂里摆着的模特儿，缺乏生气。有人说，中国人物画有很

多不画背景，不见得是活人。我说这叫意到笔不到，或叫高度集中。在画家心目中，人和环境是永远息息相关的。画家从生活环境中抽出来的个人别物，绝不意味着是脱离生活而孤立自存的人。我画舞蹈人物，我心中就有一个舞台面，还有剧场和观众。尽管只抽出许多人物中的一个画，这个人必须和周围的人有呼应，从这个人的姿态、眼神、步法可以反映出这种呼应的关系。“单打一”画人，不去接触、

体验、认识和表现人所生活的环境，这个画家的艺术成就一定狭隘、单薄、无力，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主张人物画家也要画山水、花鸟，而且要画好。如果不会画山水、花鸟，想在南方农民背后补几片芭蕉叶，也会感觉到困难，更何况画大片农村景色。作为一个人物画家，既要有生活的广度，也要有技法的广度。这就是我们进行创作所需要的基本功。

历史有不少杰出的人物画家，他们掌握的艺术方法是多方面的，人物、山水、花鸟无一不精。例如：晋顾恺之，创“传神阿睹”之说，标志人物画的造诣水平。他那篇《云台山记》可以说

是山水画的最早记述；唐吴道子有“吴带当风”之誉，是人物造型讲求动势的一种表现，他在大同殿壁上画的嘉陵山水，画史上也占有一定地位。北宋李龙眠的人物、鞍马称为白描典范。他的《五马图》穿插牧马人，两者功力都深。明陈老莲在近代浙派人物画中异军突起，山水、花鸟也别具风格；清末任伯年继陈老莲之后，振作人物画的颓势，独树一帜，他的花鸟画也吸引了几百年来

的精华，创作出新貌。假使这些大画家如同我们现在有些人那样“单打一”走独木桥，中国绘画史必将暗淡无光。

（原文写于1978年，节选自《叶浅予文集》，标题为编者所加）

跟朋友“吹牛”时无意透露：他曾多次帮助北京几名高干子弟上拍到古董，有的在香港拍，有的拿到美国或者英国去拍，价格基本上都在几十万港币以上。

三是国内一些有外商背景和黑社会背景的文物蛇头紧密勾结、互相利用，形成长期利益同盟。这样的事例机密度很高，一般不易被人发现。记者见过一位从泰国回来的广东籍“水客”，人称“泰哥”。听人说“泰哥”手里经常有一些稀少的文物珍品，他的内弟告诉我，说东西再好在他姐夫手上也握不住几天，还与他原来贩毒一样，自己不吸毒，到手就走货，不会让毒品老压在自己手上。

这种现象在罗曼教授的国外调查中得到了确认。在2008年美国洛杉矶发生的博物馆涉嫌走私中国出土文物的那起案件中，嫌犯在与联邦卧底官员的谈话中承认：他们在从中国违法收购的文物，其中不少珍品就是从一些地方官员和他们的亲属手里买到的……

以上事例足以证明：部分中国官员以及他们的亲属涉足文物走私的现象的确严重存在。

公平地说，官员收藏本来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这对提高政府官员的文化修养和对文物保护的关注度都有着积极

微上点档次的文物也得咬咬牙，更何况去购买那些动辄几百上千万元的文物珍品？

政府官员收藏热的出现，毫无疑问使中国腐败现象再次发生了恶性变异，它不但从政治上提供了钱权交易的掩护色，加剧了权力腐败的变量，而且还大大增加了打击文物走私活动的难度，使得本已十分严峻的文物巨量外流局势进一步失控。根据来自中国海关方面的资料显示：现在走私文物的发案率与日俱增，数量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猖獗，小到利用国际快件，大到集装箱成批运输，原来十几年仅查扣几千件走私文物的海关，现在经常是破获一起案件就能查扣几千件文物。而面对这一切，我们却似乎显得束手无策。

（摘自《谁在拍卖中国》）

